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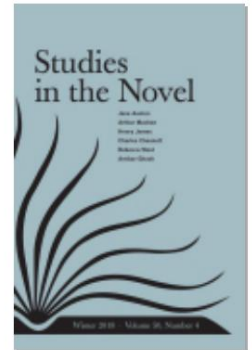


PROJECT MUSE®

奥斯汀《诺桑觉寺》中的性选择和女性选择 修道院

刘贝丝

《小说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18 年冬季,第 465-482 页 (文章)



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https://doi.org/10.1353/sdn.2018.0038>

DOI:

➔ 有关本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muse.jhu.edu/article/711747>



性选择和雌性选择 奥斯汀的诺桑格修道院

刘贝丝

我

《诺桑觉寺》的女主角凯瑟琳·莫兰经常被认为是奥斯汀最不讨人喜欢的女主角，她不仅天真，而且愚昧无趣。马文·穆德里克称凯瑟琳“无知得无可挑剔”，指她“头脑轻浮”，并声称“她太简单、太渺小”，无法引起读者的同情（44、40、53）。劳拉·穆尼汉同样认为凯瑟琳“不聪明”，“智力一般，甚至低于平均水平”（5、21；另见 25）。最近，认知进化文学评论家探讨了凯瑟琳在心智理论（即推断他人思想、感受和意图的能力）和元表征方面的缺陷，元表征涉及评估一个人对他人和世界的知识来源的有效性（见麦克马洪、内尔和劳）。尽管凯瑟琳明显表现出认知错误，比如她信任虚伪、善于操纵的伊莎贝拉·索普，怀疑蒂尔尼将军谋杀或监禁他的妻子，但她社交能力差、智力迟钝的观点却受到了挑战，因为她最终嫁给了小说中最合适的男人，她的父母承认，这桩婚事“从各方面来看都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诺桑觉寺》259）。布莱基·维米尔在谈到《爱玛》中的贝茨小姐时指出，奥斯汀肯定希望我们思考一个几乎没有明显优势的角色是如何成功生存下来的，就像贝茨小姐通过赢得村里所有人的善意而做到的，所有人都向她发出邀请、礼物和帮助（179）。同样，我们可以假设奥斯汀邀请我们思考凯瑟琳·莫兰如何克服劣势而取得成功。

凯瑟琳不像贝茨小姐那样是个贫穷的中年老处女，但没有大笔财富、没有出众的外表或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凯瑟琳很难吸引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男人。她是如何最终嫁给聪明、人脉广泛的亨利·蒂尔尼的？

进化心理学领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思维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目的是解决我们祖先面临的问题,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并将我们的基因传给后代。进化心理学特别关注所有人共有的思维机制,就像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心脏、两个肺和其他身体解剖学组成部分一样(参见 Campbell 8-11;Wright 25-26)。该领域遭到了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抵制,他们坚持认为人类心理完全由文化塑造,并认为相信人类的共同特征意味着我们是由基因决定的。然而,正如许多进化心理学家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的理论包含了环境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观点。进化使人类在应对不同环境时,在采用各种生存和繁殖成功策略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天性是无限可塑的;人类可以选择的行为选项受到物种典型的限制。尽管如此,认知进化心理学家仍然接受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塑造个体的观点,许多借鉴他们研究成果的文学评论家使用“生物文化”、“认知文化”和“认知文学历史主义”等术语来指代他们的方法。¹

二

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焦点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男性和女性的交配策略。虽然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到了性选择,但他首先在《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根据达尔文的说法,性选择涉及两个部分:雄性与其他雄性竞争获得雌性,雌性偏好某些特征,雄性为了取悦雌性而发展这些特征,即使这些特征不利于生存(标准例子是孔雀精致的尾羽,即使它们使雄性在捕食者面前更显眼并妨碍其行动,但仍吸引雌性)。长期以来,男性科学家拒绝接受达尔文的女性选择原则,而倾向于将女性描述为击败竞争对手的男性的被动接受者。

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更多女性进入该领域并关注女性的顾虑和观点(见 Buss 3;Hrdy;Campbell 60-61,309;Boyd,“Jane,Meet Charles”16-17)。尽管关于女性选择如何运作的问题和争议仍然存在,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用 Wilbur 和 Campbell 的话来说,“女性远非交配棋局中的被动棋子——她们是强大的女王,对生殖过程施加重大控制”(332;另见 Easterlin,“来自生殖资源”391-94;Wright 86;Frederick,Reynolds 和 Fisher)。

许多文学评论家发现,性选择原则与奥斯汀的小说特别相关,他们关注求爱的复杂动态,尤其是从女性的角度。博伊德声称“奥斯汀将重点放在女性选择上”(《简·遇见查尔斯》第16页),大卫·巴拉什和纳内尔·巴拉什称奥斯汀是“女性选择的桂冠诗人……性选择背后的动力”(41)。²

各种历史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奥斯汀和达尔文对择偶策略的见解为何如此一致。彼得·格雷厄姆认为,奥斯汀和达尔文都植根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注重细节和个人,而不是类型和惯例;两人都“敏锐地观察着眼前的世界……他们既善于注意微观细节,又善于辨别这些小细节的宇宙意义”(2)。此外,十八和十九世纪婚姻的法律和文化环境可能影响了奥斯汀和达尔文的观点。一方面,女性在婚姻之外几乎没有养活自己的选择,因此她们的繁荣、社会地位和生育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找到一个好丈夫。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和同伴婚姻信仰的增长等社会发展提高了女性对婚姻应提供什么的期望,并赋予了她们比过去更多的合法性。达尔文本人曾对比过“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中的性选择,指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女性的意愿,而后者则享有“自由或几乎自由的选择”。

(2:356)。社会条件影响女性和男性的性策略,可以支持或限制任何性别的交配偏好(见 Smuts; Geary 188-91; Frederick Reynolds 和 Fisher 315-16)。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让男性受益于女性对婚姻的依赖,而女性则受益于在接受或拒绝丈夫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使她更加关注和洞察性地关注性选择和女性选择的问题。³

达尔文观察到,大多数物种的雄性在选择配偶时更加热切和不加区别,而雌性则更加腼腆和挑剔,但直到罗伯特·特里弗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其亲代投资理论,人们才对这些性别差异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正如特里弗斯及其后的进化心理学家所言,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物种的雌性比雄性承担了更多的繁殖责任,因为后者只需要提供精子,而雌性则为胎儿提供子宫和九个月的妊娠期,随后是分娩、哺乳,通常还要承担大部分的育儿工作。人类儿童是动物界中最无助的动物之一,需要长时间的支持才能独立生存和繁殖。

进化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女性明智地选择一个不仅能提供良好遗传基因的伴侣非常重要

468刘

物质,而是资源和保护,让她和她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为并传承他们的基因。

相比于其他大多数物种的雄性,男性的养育投入更高。如果他们的孩子无法活到生育年龄,他们的基因就不会被遗传下来,纵观历史和文化,没有父亲的孩子比有父亲的孩子更糟糕。

因此,与女性建立联系并参与抚养孩子符合男性的利益。尽管如此,男性仍可能从生育许多孩子中受益,因为其中一些孩子能够存活并繁衍,因此他们倾向于采取两种主要的性策略:追求长期伴侣并与之一起抚养孩子,以及短期性伴侣并抛弃他们。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也可能追求短期婚外情,但她们从能对她们及其孩子做出长期承诺的伴侣那里获益最多,并且通常更喜欢这样做。⁴

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指出的那样,男女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如果男性在一生中与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他们可能生下数百个孩子,而女性可以生育的孩子数量则有限得多,这既是因为女性在绝经后就不再具有生育能力,也是因为无论她发生过多少次性行为,她每年只能生一个孩子(而且她哺乳每个孩子的时间越长,每次生育的间隔就越长)(参见 Frederick、Reynolds 和 Fisher 308;Wright 35-36)。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关注每个孩子;她们更关心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参见 Campbell 第 2 章)。

男女在生殖潜力和父母投入方面的差异,使得配偶选择对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正如简·奥斯汀所知,女性一般不像男性那样热衷于发生随意性行为,她们更愿意在求爱过程中花更多的时间来充分了解潜在的伴侣,而且她们会仔细分析追求者的性格和前景,通常会在与其他女性的交谈中这样做(尤其参见 Buss 149、155)。

需要注意的是,“性策略”一词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些策略的男性和女性有意识的计算。

我们最深层的驱动力和进化行为是为了确保生存和繁殖成功,这些行为通常在意识层面以下运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确实会计划并有目的地采取行动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些事情(除非通过心理学研究的帮助)。正如赖特所说,我们所谓的常识往往涉及进化塑造的冲动:那些“看起来‘显而易见’、‘正确’和‘可取’[或]‘错误’和‘令人憎恶’”的行为(175;另见 9-10、36-37;坎贝尔 23;巴斯 5-6)。

David M. Buss 等人进行的大量跨文化研究表明,人们对女性和男性的主要品质有着广泛的共识。

男人在寻找伴侣时会考虑的因素。女人最看重男人的特质之一是拥有资源来养活女人和她的孩子。女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男人（平均大三岁半），因为年长的男人有时间获得资源，也比年轻男人更成熟、更稳定（Buss 28）。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高社会地位的价值仅略低于资源，因为前者通常与拥有后者有关。女人也看重受过良好教育和聪明的男性，这些特质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良好的判断力。智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交技能，这对我们高度社会化的物种的“所有权力和地位关系”都至关重要（Easterlin, 生物文化方法261）。这些技能包括语言能力、对他人想法和感受的意识以及有效沟通的能力（Buss 34-35）。女性在选择伴侣时往往比男性更看重的另一个特质是幽默感，正如克里斯托弗·威尔伯和洛恩·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幽默感是一种“健康指标”，反映了智力、热情和“社交技巧”，以及应对不利生活事件的技能（337, 340）。由于过去和现在的女性都面临着被攻击性男性伤害的风险，所以她们喜欢能保护她们免受其他男性伤害的伴侣，而男性主导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身高。女性也寻求健康的男性，这可能表现在外表和打扮习惯，以及“活泼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轻快的步态”（Buss 41）。然而，女性仅仅识别拥有资源和其他理想特质的潜在伴侣是不够的。男人还必须愿意对女人做出承诺，并可靠地与她和她孩子分享他的资源。表明男人愿意对女人做出承诺的行为包括放弃与其他女人的关系，并且善良、可靠，“在伴侣遇到麻烦时伸出援手，倾听伴侣的烦恼”（Buss 43; 另见 Campbell 179）。5

男人和女人在选择伴侣时最看重的特质有所不同。

男人寻找的育龄女性（高峰年龄为 15-25 岁），她们比自己年轻，而且拥有健康迷人的特征，尤其是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能力。男性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在 DNA 测试出现之前）是，与女性不同，他们永远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大多数文化中普遍存在对女性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的痴迷，这源于男性需要确保妻子为他们生下的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们就会冒险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他人基因的传播上。研究表明，对于长期伴侣，男性和女性一样，看重善良、智慧和地位。

然而，男人选择女性进行随意性行为的标准低于选择妻子的标准；他们可能会选择年龄较大、吸引力较小、社会优势较少的女性作为长期伴侣。此外，他们不会寻找可能忠于一个男人的女性，而是寻找性滥交的迹象，例如诱人的衣着和行为，以及

470刘

与其他男性的关系史 (Buss 78-79, 83-84, 117-21; Wright 72-74) 。作为引诱女性发生随意性行为的一种策略,男性可能会通过表现出善良和忠诚的行为来欺骗女性,让她们认为他们确实有长期的兴趣,因此女性必须善于察觉男性的这种不诚实 (Buss 105, 154-55; Campbell 179-80; Wright 61-63) 。

进化青睐那些善于识破男性欺骗的女性,因为她们最终可能会找到忠诚的伴侣,可以依靠这些伴侣来支持她们和她们的后代。

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可能会选择短期婚外情。

如果合适的男性稀缺,女性可能愿意接受她们从短期伴侣那里获得的临时资源和保护。此外,由于男性对临时性伴侣的标准低于对妻子的标准,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找到比丈夫更英俊迷人、更富有、地位更高的男性。女性的理想伴侣是拥有良好基因、能可靠养家糊口的伴侣,如果一个男人无法实现这一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嫁给一个尽职尽责的“爸爸”,和一个“无赖”有染,后者会把优良基因传给丈夫帮助抚养的孩子。然而,由于即使是忠诚的男人也会嫉妒对手,不想为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投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能够成功,大多数女性必须接受某些权衡,通常是牺牲最好的基因,以换取一个足够好的男人,他会长期投资于女性和她的孩子。男人也会根据个人、物质和社会环境调整他们的交配策略。最有魅力、地位较高的男性可能会拥有多个性伴侣,但资产较少的男性可以通过培养善良、忠诚和慷慨来弥补,以吸引配偶 (Campbell 44,181-88,247;Buss 234-40;Barash and Barash 64-65;Geary 181-89,198;Frederick,Reynolds 和 Fisher 317;Wilbur and Campbell 333-34;Wright 67-70、80-85) 。

三

奥斯汀的《诺桑觉寺》展示了这些不同的冲动在两个女性角色 凯瑟琳和她的朋友伊莎贝拉 的求爱过程中的体现,其中第一个在性策略上取得了成功,第二个则失败了。凯瑟琳与《曼斯菲尔庄园》中的范妮·普莱斯很像,博伊德对范妮·普莱斯说道:“尽管她最初的处境十分不利,但她凭借自己超强的洞察他人心思的能力,找到了身边最好的男人、最坚定的伴侣 她能看到亨利·克劳福德的弱点,也能看到没有人能与埃德蒙的长处相提并论”(《简·遇见查尔斯》第 21-22 页)。

虽然凯瑟琳和范妮一样,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赢得了自己心仪的男人,但她与《曼斯菲尔庄园》的女主角不同,她似乎不具备读心术。她对表里不一的索普兄弟姐妹感到困惑,他们经常用前后矛盾的言辞来表达对真相的漠视

无论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他们言行之间的对比。

例如,她无法理解为什么约翰·索普警告她,他的马很活泼,难以驾驭,但实际上它却“安静地出发了,没有跳跃或跳跃,也没有做任何类似的事情”(59),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伊莎贝拉“追赶”两个年轻男子,她声称这两个男子的目光让她在泵房里感到厌烦(37)。她无法辨别别人话语中字面以外的任何含义,甚至似乎不知道人们说的话可能别有用心。

凯瑟琳不仅对不诚实的索普感到困惑,她还难以理解亨利·蒂尔尼,他“举止中带着一种狡猾和诙谐,这让她很感兴趣,尽管她几乎无法理解他的意思”(17)。

她不明白的是他使用的讽刺意味十足且具有双重含义。

亨利用来传达复杂含义的另一种技巧是隐喻,比如他将舞蹈比作婚姻。然而,尽管这两种经历表面上有所不同,凯瑟琳却无法辨别出它们之间的内在相似之处,她只能回答说:“但它们是如此不同!”(74)。

诸如此类的段落似乎支持了批评家们的观点,即这位女主角并不太聪明。

凯瑟琳最难过的困惑来自于伊莎贝拉和蒂尔尼上尉的矛盾行为,尽管伊莎贝拉已经与詹姆斯·莫兰订婚,但他们却公开调情。伊莎贝拉已经向凯瑟琳宣布,詹姆斯不在的时候她不会跳舞,所以当蒂尔尼上尉出现在房间里,让亨利询问伊莎贝拉的朋友,这位女士是否“反对跳舞”时,凯瑟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她非常肯定索普小姐根本不想跳舞”(134)。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凯瑟琳看到伊莎贝拉和蒂尔尼上尉跳舞,她“惊讶地”这位女士在说不想跳舞之后竟然愿意跳舞,而这位绅士在被告知她不想跳舞之后却邀请她跳舞(136)。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凯瑟琳更加苦恼了,因为她看到伊莎贝拉“在公共场合欣然接受蒂尔尼上尉的关注,并让他和詹姆斯几乎同样多地得到她的关注和微笑”,这是一种“行为不稳定”的例子,“超出了[凯瑟琳的]理解范围”(152)。

然而,尽管凯瑟琳很难推断别人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当这些心理状态涉及不诚实和欺骗时,但她在评价潜在伴侣时表现出了无可挑剔的良好判断力。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被亨利吸引,亨利被描述为“一个非常绅士的年轻人”,大约“二十四五岁”,“身材高大,面容讨人喜欢,眼睛非常聪明活泼,即使不是很英俊,也非常接近了。他的谈吐很好,”而且“他说话流利而有活力”(17)。这段描述反映了凯瑟琳对亨利的看法,她认为亨利属于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阶层,举止得体,社交技巧高超(“绅士风度”),比她大几岁

(比进化心理学家记录的典型理想年龄差距要大,但让亨利有更多时间独立于父亲而获得生活和收入),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活泼(表明身体健康),聪明,语言能力特别强。

甚至连他讽刺的谈话风格(他举止中的“狡黠和诙谐”),凯瑟琳并不完全理解,也“引起了”她的注意,认为这是他聪明和语言老练的体现。这也表明他有很好的幽默感。尽管凯瑟琳担心“他太沉迷于别人的缺点”(21),暗示他可能会批评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但他对女性的兴趣和善良体现在他对服装面料的了解以及“我姐姐经常信任我选择礼服”的声明中,这让她夫人评论道:“先生,你一定给你姐姐带来了很大的安慰”(20)。后来,凯瑟琳遇到了埃莉诺·蒂尔尼,了解到她非常关心她的哥哥,并认为他是一个宝贵的伙伴,这进一步加强了亨利对妹妹的忠诚。

凯瑟琳对亨利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发现他的优点。当她发现艾伦太太从埃莉诺·蒂尔尼的同伴休斯太太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家庭的事情”时,凯瑟琳向她的监护人打听消息,问了一些问题,比如“他们来自格洛斯特郡的哪个地方”,以及“我的[舞蹈]舞伴蒂尔尼先生是否是独生子”,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将决定亨利是否会继承家族财产(65)。虽然艾伦太太没有记住多少信息,但凯瑟琳最终确实了解到蒂尔尼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家庭,社会地位比她自己的要高,当她第一次见到蒂尔尼将军时,她被他们所有人的“英俊”所震惊(78)。亨利在比琴悬崖散步时,不断用他的智慧给凯瑟琳留下深刻印象,他谈论美学原则和政治,在他们前往诺桑觉寺的旅途中,他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戏仿的哥特式叙事,展现了生动的想象力和俏皮的幽默感。亨利善于读懂别人的心思,这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社交能力,因为他密切关注别人通过言语和非语言符号传达的信息,并做出适当的回应,比如当他推断出凯瑟琳收到的来自她哥哥的信中宣布

他与伊莎贝拉的分手,让凯瑟琳惊呼:“你反应真快!”(210)。

此外,尽管亨利有讽刺的倾向,但他对凯瑟琳还是很仁慈和忠诚的。当他揭露凯瑟琳误以为蒂尔尼将军以哥特式恶棍的方式谋杀了他的妻子时,凯瑟琳感到羞愧,担心失去亨利的尊重。相反,她却得到了亨利“惊人的慷慨和高尚的行为”,因为他事后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而是以“安抚性的礼貌”和“比平时更多的关注”对待她,这样“她的精神很快就变得非常舒服”(206, 204)。他没有利用自己对凯瑟琳失误的了解来取笑和羞辱她,而是向她保证,他

持续的爱和对她幸福的关心。最重要的是,当蒂尔尼将军得知凯瑟琳不会继承艾伦先生的财产后禁止亨利娶她时,亨利大胆地违抗父亲的命令,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莫兰小姐的荣誉和爱意都同样重要”,而他父亲的任何坚持“都无法动摇他的忠诚”(257)。他表明,即使在逆境中,当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自身利益时,他也会忠于凯瑟琳。

这并不是说亨利没有缺点。凯瑟琳从她的哥特式不幸经历中了解到,所有人都是优点和缺点的混合体,这一见解包括意识到即使是亨利·蒂尔尼的性格也可能包含“一些轻微的缺陷”(206)。他对那些他认为智力低下的人可能会相当自鸣得意和傲慢,他对人类弱点的认识养成了一种讽刺性的超然倾向,这让一些读者想起了《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先生。

6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财富和地位的必需品还是从忠诚和善良的奢侈品(用 Geary 的区分[见注释 5])来看,亨利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潜在丈夫。

如果说凯瑟琳善于识别可能成为有价值的长期伴侣的追求者,那么她同样善于识别不太合适的男性。她很快就得出结论,她不喜欢约翰·索普的陪伴,因为索普来自一个地位不稳定、资源匮乏的家庭。索普的性格特征也不太可能吸引有鉴赏力的女性。他举止粗鲁,社交能力差。他谈论凯瑟琳不感兴趣的话题,吹嘘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这让凯瑟琳感到厌烦。

他的言辞中明显夸大其词、自相矛盾,表现出他的不诚实和缺乏智慧,甚至让天真的凯瑟琳都怀疑他说的不是实话。更严重的是,当凯瑟琳看到埃莉诺和亨利后,索普拒绝停下马车,而是“只是大笑,拍打鞭子,鼓励马儿……然后继续赶路”(86),这一行为暴露了他的残忍,杰弗里·赫勒勒将此行为解读为绑架和“象征性的强奸”(240)。索普的自私、虚伪和侵略性进一步显现出来,他背着凯瑟琳告诉埃莉诺,凯瑟琳不能遵守第二天与她和她哥哥一起散步的约定,然后抓住凯瑟琳的手,用身体阻止她追求蒂尔尼小姐。此外,他还侮辱他的母亲和姐妹,告诉前者她看起来像“一个老巫婆”,告诉后者她们“看起来很丑”(44),这表明他虐待与他亲密的女性。

约翰·索普可能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糟糕的丈夫选择。他缺乏资源、地位、智慧、社交技巧和对女性的善意。但凯瑟琳也证明了她善于发现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男人的缺点,亨利的兄弟蒂尔尼上尉。当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她评价他是“一个非常时尚、英俊的年轻人”。她

甚至认为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比他哥哥更帅,但在她眼里,他的神态更傲慢,他的面容也不那么讨人喜欢。他的品味和举止无疑明显低劣;因为在她听来,他不仅反对对自己跳舞的想法,甚至还公开嘲笑亨利认为这是可能的。(133)

凯瑟琳准确地察觉到,尽管蒂尔尼上尉比他的哥哥好看,而且作为长子,他也会更富有,但他却傲慢冷漠,他像达西一样拒绝在巴斯舞厅跳舞,这反映出他认为那里的女人不值得他关注,因为她们的阶级地位低下。如前所述,凯瑟琳对蒂尔尼上尉对伊莎贝拉的调情深感不安,他知道伊莎贝拉已经和詹姆斯·莫兰订婚了,当她终于意识到他从来没有爱过伊莎贝拉,也没有打算娶她时,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他”(225)。凯瑟琳认识到,蒂尔尼的小儿子可能通过培养自己的智力和对女性的忠诚来弥补自己较差的外表吸引力、地位和财富,比他的哥哥更适合结婚。

伊莎贝拉在与异性打交道方面据说更有经验和更精明(她“可以发现任何只对彼此微笑的绅士和女士之间的调情;并在人群中指出一个测验”[26]),但她在区分适合丈夫的男性和只寻求短期关系的男性方面远不如凯瑟琳。伊莎贝拉抛弃了忠诚可靠的詹姆斯·莫兰,选择了更潇洒、更符合社交条件的蒂尔尼上尉,蒂尔尼上尉最初像“[她的]影子”一样跟随她,并声称他希望她“心地独立”,大概是为了让她把它赋予他(223,149)。

伊莎贝拉没有意识到蒂尔尼上尉只是假装爱她,以此引诱她陷入短期恋情。伊莎贝拉可以找到富有英俊的蒂尔尼上尉来建立这种关系,但正如埃莉诺和亨利告诉凯瑟琳的那样,他们的兄弟不太可能娶一个没有“人脉和财富”的女人。然而,她缺乏地位和财富并不是伊莎贝拉唯一的缺点。埃莉诺敏锐地指出,她的兄弟向伊莎贝拉求婚会很奇怪,“一个在他眼前违背自愿与另一个男人订立的婚约的女孩!……还有弗雷德里克,他一直如此骄傲!他发现没有一个女人值得爱!”(211)。有辨别力的蒂尔尼上尉不太可能选择公开表现出不忠诚的女人作为长期伴侣,但她轻易地将注意力从一个男人转移到另一个男人身上,加上她诱人的行为,使她成为短期联络的合适目标。

小说为伊莎贝拉辩护时指出,她的家庭背景可能影响了她的错误选择。伊莎贝拉的父亲已经去世,留下了他的

物质条件较差的妻子和孩子。研究表明,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比在有父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更容易性生活混乱。由于她们没有一个始终如一地供养和保护丈夫的榜样,这些女孩可能会认为男人不可靠,她们最好从多个短期伴侣那里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追求长期伴侣 (Buss 93; Campbell 187-88, 194)。伊莎贝拉也可能在寻求理想的女性性策略。保留詹姆斯·莫兰作为稳定的供养者,但生一个拥有弗雷德里克·蒂尔尼优良基因的孩子 (见 Geary 198)。然而,如果这是她的目标,她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它,而且由于过度追求,她最终得不到任何男人,名誉受损,这将危及未来的婚姻前景。此外,伊莎贝拉似乎低估了表明男人愿意对女人做出承诺的性格特征的重要性。当她发现詹姆斯·莫兰的家庭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富有时,她对詹姆斯·莫兰失去了兴趣,并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富裕的蒂尔尼上尉身上。当蒂尔尼抛弃她时,她在给凯瑟琳的信中抱怨道:“很难知道该相信谁”(223)。

然而,凯瑟琳知道该信任哪个男人,因为她对那些表明忠诚和愿意分享资源的迹象很敏感,而不仅仅是拥有资源和优良基因。

凯瑟琳也比她的朋友更能说服她的追求者,让她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好妻子。通过表达对伊莎贝拉对她哥哥的不忠以及她给他带来的痛苦的极度痛苦(她认为伊莎贝拉的行为让詹姆斯“感到沉重和不安”[152]),她向亨利传达了她非常重视女性的忠诚。事实上,凯瑟琳无法理解伊莎贝拉和蒂尔尼船长的感受和动机,以及“爱上一个男人的女人不能和另一个男人调情”(103)这样的断言,让亨利明白,不忠甚至不是她能理解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对其他人心理状态的迟钝和无法察觉不诚实或自私实际上有助于她的性策略,因为她的思维习惯向她的追求者强调了她自己永远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在其他方面,凯瑟琳缺乏心智理论,这实际上可能是她追求亨利·蒂尔尼的一大优势。在一段文字中,亨利直接评论了凯瑟琳无法推断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意图和态度,他接着称赞了她的这一特质。

“你把我哥哥想和索普小姐跳舞的愿望仅仅归因于善良,”亨利说,“这让我相信,你自己的善良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135)。亨利没有把它们视为负担,而是称赞凯瑟琳对别人的负面特征视而不见,倾向于对每个人都抱有好感,这向他传达了她的善良和信任他人的倾向。这些都是他看重的妻子的品质。亨利还发现凯瑟琳在许多问题上的无知很有吸引力,正如我们在他演讲时了解到的那样。

在他们在比肯悬崖上散步时,她向她讲述了风景如画、政治和历史,叙述者告诉我们“聪明的年轻人”通常会被“长相漂亮、心地善良、头脑无知的女孩”所吸引(112)。

如果简·奥斯汀是在巧妙地讽刺男人自负地偏爱那些让他们感到智力优越的女人(如朱丽叶·麦克马斯特所说,在这段话中,叙述者讽刺的对象是亨利而不是凯瑟琳[154]),那么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为什么凯瑟琳在教育和社交能力方面的缺陷特别吸引亨利,从而帮助了这位所谓无知的年轻女士。在巴斯,凯瑟琳被一群试图欺骗她的表里不一的人包围,但她自己也在欺骗别人。正如丹尼斯·德拉罗萨·卡明斯所解释的那样,欺骗涉及“违反隐性社会规范”(232,卡明斯强调),而对于生活在等级社会中的物种来说,比如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违反规范往往涉及地位较低的个体试图提高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为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保留的资源。

卡明斯和其他人认为,欺骗者识别是人类“在生物学上倾向于发展”的众多认知功能之一,因为识别违反规则的能力在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并且在生命早期就出现了(卡明斯 240;另见博伊德的《简·遇见查尔斯》7-9)。根据她进行的实验,卡明斯得出结论,地位较高的人“更有可能发现地位较低的人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而反之亦然”,因为前者有既得利益来维护他们的优越地位和特权(233,卡明斯重点)。

对于处于较低等级的人来说,违反社会规则并冒着受到上级惩罚的风险是危险的,但是,如果他们成功违反这些规则而不被抓住,他们就会受益,因为他们可以提高在群体中的地位、获取资源的机会以及繁殖成功率。

伊莎贝拉·索普显然希望通过嫁给一个地位和财富都比她高的男人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获得资源的机会,这种做法在社会科学中被称为高攀婚姻(Barash and Barash 45)。亨利·蒂尔尼将伊莎贝拉定义为一个社会攀登者,他说她只会在“出现一位男爵”之前忠于蒂尔尼船长,凯瑟琳意识到这意味着伊莎贝拉寻求结婚主要是“为了野心”

(212)。然而,凯瑟琳也意识到,她和伊莎贝拉很相似,都是社会地位“微不足道”的年轻女性,没有大笔财富,希望嫁入富裕的蒂尔尼家族(214)。因此,凯瑟琳和伊莎贝拉一样,犯了“欺骗”的罪,她试图找到一个超出她预期的伴侣,而根据她所在的等级社会的规则,她无权找到这样的伴侣,她还冒着受到上级惩罚的风险,因为上级希望维持现状,阻止下级获得特权。

这正是当蒂尔尼将军发现凯瑟琳并不是他所认为的继承人时发生的事情,他对凯瑟琳的欺骗行为感到非常愤怒。

把他赶出了家。7我们最终得知,约翰·索普告诉蒂尔尼将军,莫兰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凯瑟琳也将继承艾伦先生的财产,在许多场景中,索普和蒂尔尼将军都发表了反映这些信念的评论。

在他们第一次乘坐马车时,索普问凯瑟琳:“老艾伦和犹太人一样富有 是吗?”然后他接着问艾伦一家有没有孩子,艾伦先生是不是凯瑟琳的教父(59)。蒂尔尼将军认为凯瑟琳的恩人是他的竞争对手,因此经常问这位年轻的客人艾伦先生的财产是否和他一样可观(例如 170、183)。对于索普和将军在想什么的所有这些暗示,凯瑟琳的反应是完全不理解。同样,当蒂尔尼将军暗示他希望她和亨利结婚时,比如当他告诉她他可能很快就会给自己以外的人买一套新茶具时,她“可能是聚会中唯一——一个不理解他的人”(179)。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的愚钝是一种有效的性策略。蒂尔尼将军错误地认为她拥有大量财富,这显然对她有利,因为他鼓励她与儿子交往,并邀请她参观诺桑觉寺。凯瑟琳知道,要让两人的关系走向婚姻,就必须与亨利亲近,因为当她担心艾伦一家会提前离开巴斯时,“她的整个幸福似乎都岌岌可危”(94),当蒂尔尼将军把她赶出家门时,她的悲伤源于她想到“对亨利的希望、所有期望都化为泡影……谁能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234)。她母亲还暗示她可能会在“几年内”再次遇到埃莉诺和亨利,这让她很沮丧,因为凯瑟琳意识到亨利到那时可能已经“忘记了她”,并与别人相恋甚至结婚(245)。

凯瑟琳能否嫁给亨利取决于她是否能花足够多的时间陪伴他,但她不能表现出故意为他谋取利益,或误导他和他的父亲有关她的前途。凯瑟琳没有理解别人认为她比自己更富有的暗示,因此她成功获得了拜访亨利一家的重要邀请,但同时也免除了人们怀疑她自己对欺骗将军负有责任的嫌疑。

如果将凯瑟琳的行为与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雷斯》中同名女主角的类似计划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凯瑟琳的行为与一个聪明的策略很相似。在一集中,摩尔的财务资源减少了,她发现她所在社区的男人们不会娶一个没有财富的女人。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摩尔散布谣言说她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她很快就有了许多追求者。摩尔意识到她“玩了一个狡猾的游戏”,因为“欺骗一个男人结婚……假装有钱”是“一个女人能采取的最危险的步骤之一,她事后被虐待的风险最大”(78, 84)。因此,摩尔选择了一个好的-

一个性格开朗的男人,他坚称自己热烈地爱着她,在一个关键场景中,她告诉他她很穷,尽管她意识到他认为她在说谎。他抗议说他只想要她一个人,所以当她们结婚时,他发现她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富有,“虽然他事后可能会说他被骗了,但他永远不会说我欺骗了他”(80)。莫尔帮助减轻了丈夫的失望,她首先让丈夫认为她一无所有,然后逐渐分期偿还她所拥有的钱,所以他最终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并不完全一贫如洗。

凯瑟琳与蒂尔尼家族的经历与莫尔相似,甚至蒂尔尼将军首先从约翰·索普那里得知凯瑟琳将继承一大笔财富,然后得知她的家庭绝对“贫困”(256),因此当他得知凯瑟琳的父亲并不穷,而且“凯瑟琳结婚后会得到三千英镑”(261)时,他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下来。当然,不同之处在于,莫尔有意识地策划欺骗和操纵她的未来丈夫,而凯瑟琳取得了与莫尔相同的结果,但她没有任何欺骗行为,也没有承担散布有关其净资产的谣言的责任。

通过将凯瑟琳与爱玛笔下的贝茨小姐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她所谓的轻信和愚昧天性的实际优势,叙述者将贝茨小姐描述为“没有智力上的优势……可以吓唬那些可能恨她的人,让他们表面上尊重她”,而爱玛也同样评论说“没有人怕她:这是一种很大的魅力”(20,91)。

根据维米尔的说法,贝茨小姐明显缺乏智力,而且倾向于“敏锐地洞察每个人的优点”(奥斯汀,《爱玛》20),但看不到他们的缺点,这是一种“成功的社交策略”,可以解除他人的戒心,促使他们光顾她(既感到优越,又为她谋取利益)(179)。同样,凯瑟琳的坦率和无法察觉他人别有用心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社交和(对她来说)性策略,因为这些特征使她看起来无害,尤其是对社会上级来说,否则他们可能会怀疑她试图侵犯他们的领域。事实上,当亨利得知凯瑟琳怀疑他的父亲有犯罪行为时,他的不快可能部分源于他对凯瑟琳妄自评判“比她好的人”感到震惊。当凯瑟琳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失去亨利的尊重时,她很快又恢复了以前对亨利父亲的言辞和良好意图的盲目信任,比如她认为亨利不会介意她不富有,因为他“在金钱问题上表达了最慷慨和无私的看法”,她甚至怀疑“他的孩子们误解了他在这类问题上的态度”,他们把他对婚姻的看法描述为唯利是图(214)。

这并不意味着凯瑟琳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嫁给亨利的目标。正如巴斯所指出的,性关系不仅

所有人采取的策略并不涉及“有意识的计划或意识”，但实际上，当这些策略“在行为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时，它们会取得更好的效果（6）。赖特甚至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自我欺骗可能有助于生存和繁殖成功，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追求自身利益，而不会产生故意诡计所导致的冲突。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无辜的算计。用赖特的话来说，“我们欺骗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欺骗别人”（264；另见9-10,36-37）。

另一方面，凯瑟琳并非完全被动或毫无计划，而是积极而有目的地试图塑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就像伊莎贝拉与凯瑟琳交朋友是为了讨好詹姆斯·莫兰一样，凯瑟琳也与埃莉诺·蒂尔尼培养友谊，以促进她与亨利的关系。在她遇见埃莉诺的第二天，“她心中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增进与蒂尔尼小姐的了解”（56），尽管那天她和哥哥以及索普一家一起坐马车时受到了阻碍，但第二天她“决心再次与蒂尔尼小姐见面”的决心仍然坚定不移。

（68）。当她在泵房里偷看埃莉诺时，她从伊莎贝拉和詹姆斯身边走开，走到她想更好地了解年轻女子面前，开始交谈。在布莱兹城堡的灾难性之旅之后，当约翰·索普的谎言导致凯瑟琳违背了与亨利和埃莉诺一起散步的约定时，凯瑟琳决心向兄弟姐妹解释她的错误，并恢复他们对她的好感。她在泵房得到了他们在巴斯的地址，并拜访了蒂尔尼小姐，但没有被允许。虽然她担心埃莉诺被冒犯并拒绝见她，但那天晚上在剧院里，她并没有因为亨利而受到阻拦，直到她引起他的注意，然后当他走进她的包厢看她时，她热情地道歉。

第二天，当约翰·索普试图取消她与蒂尔尼一家散步的第二次约定，并告诉埃莉诺凯瑟琳希望将他们的旅行推迟一天时，埃莉诺“挣脱”了试图用身体阻止她的约翰和伊莎贝拉，“几乎是跑”到蒂尔尼一家的住处，想收回约翰的谎言，重新开始他们的计划（101-02）。

这些段落清楚地表明，如果凯瑟琳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如何有助于她与亨利的追求，那么毫无疑问，她渴望他的关注并积极寻求与他的联系。事实上，当叙述者指出亨利对凯瑟琳的依恋始于“感激，或者换句话说，说服她对她的偏爱是她认真考虑的唯一原因”时，她承认了凯瑟琳的优越性。

（252-53）。在他们相识之初，亨利就表示，在婚姻中“男人有选择权，女人只有拒绝的权力”（74），但奥斯汀认为凯瑟琳在决定他们关系的结果方面比他更有影响力。在《诺桑觉寺》中，在男女主人公的求爱中，女性的选择比男性的选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凯瑟琳天真、无能甚至愚蠢的印象,被小说中所有角色中她运用最成功的性策略所颠覆。与伊莎贝拉不同,她不仅能有效地找到一个有望成为丈夫的男人,并说服他她会成为一个好妻子,而且她的愚钝和似乎无法读懂别人的心思,可能被认为是她通过高攀婚姻改善自己处境的目标的资产,因为这些认知上的失误使她能够打破规则而不引起社会上层人士的怀疑,他们认为她是无害的,不会算计。事实上,评论家们对凯瑟琳性格最不满的特质,可能正是她在《诺桑觉寺》中描绘的等级社会和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奥斯汀对女性选择的兴趣和她对达尔文所说的性选择动态的洞察力,在她最早完成的小说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示。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笔记

该论文的简短版本以“诺桑觉寺与性选择:基因永生”为题发表于《Persuasions On-Line》第 38 卷第 1 期(2017 年)。

¹ 参见 Zunshine;Boyd, 《论起源》第 25 页;Easterlin, 《生物文化方法》第 19-23 页;Stasio 和 Duncan 第 135-37 页;Wright;Campbell;Buss;Boyd, 《论起源》和 Easterlin, 《生物文化方法》中提供了关于进化心理学的优秀介绍,概述了进化心理学的历史,解释了进化心理学的前提,并回应了批评者,尤其是第 1 章和第 5 章。有关进化文学批评的不同方面和实践者的支持和反对论据,另请参阅 Kramnick;六篇对 Kramnick 的回应(由 Paul Bloom、Brian Boyd、Joseph Carroll、Vanessa Ryan、G. Gabrielle Starr 和 Blakey Vermeule 撰写),载于《批判性探究》第 38.2 页(2012 年);以及 Flesch,尤其是《导言》。

² 博伊德分析了《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女性选择。巴拉什和巴拉什分析了《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斯塔西奥和邓肯以及约瑟夫·卡罗尔从进化的角度分析了《傲慢与偏见》。

3其他作者也讨论了可能有助于解释奥斯汀对求爱和婚姻的处理的历史环境,这些处理方式预见了达尔文的思想并与进化心理学的发现相一致,这些作者包括斯塔西奥和邓肯(133, 137)以及伊斯特林的《从生殖资源出发》(394)。

另请参阅注释 5。

⁴ 关于女性普遍偏爱长期关系而非短期关系,请参阅 Buss 88 和 Campbell 188,207。Trivers 理论的某些方面(尤其是被其他人过分简化的方面)受到了质疑或限制,例如男性从多次交配中获益总是多于女性的观点(请参阅 Tang-Martinez 和 Ryder;Mulder)。然而,本文和后续段落中总结的父母投资理论的核心原则仍然是研究交配策略中的性别差异的核心,也是我所参考的所有著作的共同点。

⁵ 吉里尔将女性(和男性)的偏好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

他认为“文化上的成功”(无论每个社区如何定义)是女性在男性身上寻求的首要必需品,而“使长期关系令人满意”的其他特质,如善良、智慧和可靠性,则是奢侈品(189)。根据 Geary 的说法,拥有足够数量的男性且收入充足的社会允许女性享受她们择偶偏好的奢侈品。这样的社会包括现代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我们可以将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世界归入这一类别(见 Geary 183-91)。

6穆尼汉 (17-25) 和麦克斯特 (154-55) 都将亨利与班纳特先生进行了比较,但麦克斯特认为,凯瑟琳以“新鲜的反应和迅速投入的情感”,会阻止他沦为像班纳特先生那样的“油嘴滑舌的讽刺作家”(155)。

⁷ 在简·奥斯汀的时代,高攀婚姻并没有被普遍视为违反社会规范,但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明确描述了蒂尔尼将军和凯瑟琳·德·包尔夫人等人物,他们也持这种观点。甚至亨利·蒂尔尼的出轨检测机制也被像伊莎贝拉这样过于公开地争取高攀婚姻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所激发。

参考文献

奥斯汀,简。艾玛。理查德·克罗宁和多萝西·麦克米伦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诺桑觉寺》。Barbara M. Benedict 和 Deirdre Le Faye 编。剑桥:剑桥UP,2006年。

Barash, David P. 和 Nanelle R. Barash。《包法利夫人的卵巢:达尔文主义的文学观》。纽约:Bantam Dell,2006年。

博伊德,布莱恩。“简,遇见查尔斯:文学、进化和人性。”哲学与文献22.1 (1998): 1-30。

。《故事的起源:进化、认知与虚构》。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

Buss, David M. 《欲望的进化:人类的交配策略》。修订版。纽约:Basic书籍,2003年。

坎贝尔,安妮。《她自己的思想:女性的进化心理学》。牛津:牛津UP,2002年。

卡罗尔,约瑟夫。“人性与文学意义:以对《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为例的理论模型。”《文学动物:进化与叙事的本质》。乔纳森·戈特沙尔和戴维·斯隆·威尔逊编。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76-106。

Cummins, Denise Dellarosa。“欺骗者检测受社会等级影响:支配地位对认知功能进化的影响。”《进化与人类行为》20.4 (1999):229-48。

达尔文,查尔斯。《人类的起源和性别选择》。引言。约翰·泰勒·邦纳和 Robert M. May. 2 卷合为 1。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

笛福,丹尼尔。《著名莫尔·弗兰德斯之幸运与不幸》。编辑:GA Starr。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

Easterlin,Nancy。《文学理论与解读的生物文化方法》。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2年。

。 “从生殖资源到自主个性?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进化的女皇:达尔文主义对女性本质的看法。编辑:Marianne L. Fisher, Justin R. Garcia 和 Rosemarie Sokol Chang。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390-405。

Flesch, William。报应:代价高昂的信号、利他主义的惩罚和其他生物学《小说的构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

Frederick, David A.,Tania A. Reynolds 和 Marianne L. Fisher。“女性选择的重要性:从进化的角度看女性交配策略的限制、表达和变化。”《进化的女皇:达尔文主义对女性本质的看法》。编辑:Marianne L. Fisher,Justin R. Garcia 和 Rosemarie Sokol Chang。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304-29。

Geary, David C. 《男性与女性:人类性别差异的演变》。第二版。华盛顿特区:美国心理学会,2010年。

格雷厄姆,彼得·W。《简·奥斯汀与查尔斯·达尔文:博物学家与小说家》。奥尔德肖特:阿什福特,2008年。

Herrle, Je rey。“白痴的习语:简·奥斯汀那些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追求者的语言和对话。”《简·奥斯汀的谈话》。Bruce Stovel 和 Lynn Weinlos Gregg 编。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出版社,2002年。237-51。

482刘

Hrды, Sarah Blaire. “逾期对话:《进化的女皇》序言。”《进化的女皇:达尔文主义的女性本性观》。Maryanne L. Fisher, Justin R. Garcia 和 Rosemarie Sokol Chang 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15-19 页。

Kramnick, Jonathan. “反对文学达尔文主义。”《批判性探究》37.2 (2011): 315-47。

Lau, Beth. “《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读心术教育。”简·奥斯汀与心灵科学。Beth Lau 主编。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2018 年。第 37-57 页。

MacMahon, Barbara. “《诺桑觉寺》中的元表征与解耦:第一部分。”英文版研究90.5 (2009): 518-44。

“《诺桑觉寺》中的元表征与解耦:第二部分。”英语研究90.6 (2009): 673-94。

麦克马斯特,朱丽叶。小说家简·奥斯汀:过去和现在的随笔。Houndmills:麦克米伦, 1996 年。

Mooneyham, Laura G. 《简·奥斯汀小说中的浪漫、语言和教育》。Houndmills:麦克米伦出版社, 1988 年。

马文·穆德里克。简·奥斯汀:反讽作为防御和发现。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8 年。

Mulder, Monique Borgerho. “连续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妻多夫制?坦桑尼亚皮姆韦人的婚姻。”《人性》20.2 (2009): 130-50。

Nelles, William. “简的大脑:奥斯汀与认知理论。”ILS:跨学科文学研究16.1 (2014): 6-29。

Richardson, Alan. “文学与认知研究:实地地图”。小说作品:认知、文化和复杂性。Alan Richardson 和 Ellen Spolsky 编。奥尔德肖特:阿什盖特出版社, 2004 年。1-29。

Smuts, Barbara B. “父权制的进化起源。”《人性》6.1 (1995): 1-32。

Stasio, Michael J. 和 Kathryn Duncan. “简·奥斯汀的进化论:《傲慢与偏见》中的史前偏好。”小说研究39.2 (2007 年): 133-46。

Tang-Martinez, Zuleyma 和 T. Brandt Ryder. “范式问题:以贝特曼的世界观为例。”综合与比较生物学45.5 (2005): 821-30。

Vermeule, Blakey. 《我们为什么关心文学人物?》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Wilbur, Christopher J. 和 Lorne Campbell. “迷倒她们?雌性战略性交配行为是提供扫帚的手段。”《进化的女皇:达尔文主义对女性本质的看法》。Maryanne L. Fisher, Justin R. Garcia 和 Rosemarie Sokol Chang 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330-44 页。

赖特,罗伯特。《道德动物:进化心理学与日常生活》。纽约:Vintage Books, 1995 年。

Zunshine, Lisa. “导论:什么是认知文化研究?”认知文化研究导论。Lisa Zunshine 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2010 年。1-34。